格局，認為眞正的「中原」應指長江中游與黃河鄭洛之間的農耕平原。考古資料表明，長江中游自舊石器晚期以來，至新石器時代，其文化發展一脈相承至青銅時代，從未斷絕。約公元前1300年，隨着北方殷墟族群南下征服盤龍城，吸收其文化並自詡為商，政治中心才開始北移。本書承襲作者既有論述，突破傳統成說，完全從資料出發，為重構上古史提供了新範式、新證據。

其三，注重多學科融合的自覺與反思。儘管以考古資料為根本依據，作者在具體分析過程中靈活運用文獻考據、圖像解析、藝術母題溯源、古文字釋讀及神話學、人類學等多元方法，形成獨具特色的研究路徑。當前學界雖普遍宣導跨學科研究，試圖從多維度深化對先秦社會的認知，並借此重塑歷史格局、提升研究視野，但在實踐中常陷入「理論先行」與「結論先行」的誤區——或以外來理論框架生硬切割史料，或以預設觀點篩選證據，導致對歷史細節與文化語境的遮蔽。本書則始終以問題為導向，審慎評估不同資料與方法在研究目標中的適用性與邊界，從而構建起一個根植於中國上古文化的闡釋體系，為重新理解青銅時代的社會結構、思想觀念、宗教信仰與禮俗實踐開闢了新的可能。

正如陳寅恪先生近百年前所宣導的「預流」精神，在考古資料日益豐富的今天，先秦史研究亟需以新視角切入關鍵問題，從而推動學術格局的革新。在這一學術脈絡下，《商文明》通過對信仰體系的結構性解讀，實現了對先秦歷史圖景的深度重構。該書的學術意義遠不止於青銅時代研究，其獨特的問題意識與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對後世不同時期的文化史研究亦具有重要的參照價值。

任欣
南京大學全球人文研究院

**孫正軍，《禹跡茫茫：唐宋嶺南九州分野言說的知識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362頁。**

在中國古代，〈禹貢〉九州是一個重要的地理概念，其如何影響後世的地理認知，學界研究尚有待開拓。孫正軍著《禹跡茫茫：唐宋嶺南九州分野言說的知識史研究》是關於此問題的第一部專著。該書以嶺南歸屬九州的言說為研究對象，時段主要限定在唐宋。嶺南地區相對較晚才被納入中原王朝

的版圖，在〈禹貢〉九州中的定位並不清晰，故而其九州歸屬言說也往往多變且較為複雜。諸說因何產生、何時流行？反映了什麼樣的認知取向？都是該書欲探討的主要問題。

全書分為緒論、主體、附錄三大部分。緒論交代了基本概念「嶺南」的地域範圍、「分野」的類型以及「知識史」的研究視角。

主體部分共分為8章。第一章研究了九州分野體系的形成過程。〈呂氏春秋・有始覽〉將天之「九野」與地之「九州」並舉，已蘊含九州分野的思想。〈漢書・地理志〉將九州的山川藪浸列於小注中，表明撰者已有以現實地理比附九州的意識。這種意識影響了漢魏時期地方行政區劃的調整，進一步強化了九州與現實地理的關聯。九州分野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已經進入了地理文獻的書寫，臧榮緒《晉書》、王隱《地道記》等地理文獻皆存在以晉世諸州比附九州的內容，影響了唐初〈晉書・地理志〉的修纂。九州分野的最終形成體現於〈隋書・地理志〉中。〈隋志〉以九州為綱，並在每州後記其所對應之星宿、星次、十二辰和諸侯國，確立了九州分野和天文分野、州國分野的對應關係，九州分野體系至此發展到成熟完備的狀態。

九州分野在唐宋時期成為分野言說的主要形式。以現實政區比附九州的做法見於諸多地理文獻。這些文獻包括地理總志、地方志、正史地理志、類書或政書的地理部分等。第二章主要從記述體例方面對唐宋時期相關文獻進行了全面且細緻的梳理。在這些文獻中，以九州比附現實政區的主要有單州列舉和廣域比附兩種形式。上述唐宋文獻中，有些地域的九州歸屬存在分歧，分歧最大的廣域政區即為嶺南。

第三章梳理了嶺南在唐宋地理文獻中的九州分野言說。唐宋時期出現了4種關於嶺南九州分野的主流看法：屬揚說；西部屬荊、東部屬揚說；不屬九州說；三分說。屬揚說可見於〈晉書・地理志〉和〈隋書・地理志〉，將嶺南作為一個整體歸屬揚州。西部屬荊、東部屬揚說可見於《十道志》，嶺南諸州或屬揚州、或屬荊州，也有部分州未言明其屬九州情況。不屬九州說可見於〈通典・州郡門〉，將嶺南整體排出九州。三分說可見於《元和郡縣志》，嶺南分屬荊州、揚州及九州外（頁112）。在這4種主流言說之外，將嶺南北部整體歸屬荊州的「北部屬荊說」也可見於唐宋以降文獻，該書也將其納入研究範圍。從第四章開始，作者就每種言說的生成、流傳進行了細緻的研究，每種言說各佔一章。

第四章研究了嶺南屬揚說。嶺南屬揚之說至遲在東漢已經出現，在東晉南朝已頗為流行。嶺南屬揚說在唐以前是嶺南九州分野的主流言說，唐

以後，屬揚說由於受到其他言說的衝擊，不再一家獨大。明清時期，屬揚說在文獻中已難覓蹤跡。嶺南屬揚說源於嶺南在天文分野和州國分野中的定位，也符合早期〈禹貢〉學對九州境域的劃分，因此成為最早的主流觀點。但嶺南屬揚說也存在缺陷，成為其在唐以後日漸式微的原因之一（頁143）。

第五章研究了嶺南西部屬荊說。該說源於一行的山河兩戒理論，主張嶺南東部屬揚、西部屬荊。一行的分野言說被兩唐書天文志所記載，西部屬荊說由此確立。該說在唐代文獻中並不多見，但在宋代逐漸顯現，可見於蔡戡〈分野論〉、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收〈唐一行山河分野圖〉、《永樂大典》引宋修《容州志》等史料。西部屬荊說在明清時期影響更加顯著，成為嶺南分野言說的主流模式。但相比於一行分野，明清時期荊揚分界的具體位置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些變化主要受行政區劃的影響，局部地區的變化是遵循自然地理要素的產物。

第六章研究了嶺南不屬九州說。該說在先唐文獻中已見端倪，但首次明確提出嶺南在九州之外的文獻是杜佑的《通典》。杜佑出於「王者不以土地為大」的邊疆保守主義，在〈通典・州郡門〉中設置「古南越」編排嶺南地理，將嶺南明確排除在九州之外，開創了不屬九州說（頁207）。不屬九州說在宋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傳播，〈文獻通考・輿地考〉仿照〈通典・州郡門〉的體例，將嶺南歸為「古南越」，宋代地圖和嶺南地方志中也有將嶺南排除在九州外的例子。不屬九州說在明清時期依然存在，但在知識精英和嶺南地方士人兩個不同群體中的接受程度有明顯差異。

第七章研究了三分說。該說始見於《元和郡縣志》，《元和志》體例為單州列舉，將部分州歸屬荊、揚及九州外，雖然還有大量州的九州歸屬未被《元和志》記載，但嶺南分屬荊、揚及九州外明確無疑。三分說在唐宋時期多見於單州列舉體例的文獻，這些文獻的撰者出於對嶺南各地九州分野的陌生，只能通過搜檢前史遺文的方式形成嶺南九州分野的構建，從而呈現零散不全的面貌。在眾多分野言說中，三分說相對不彰，這是由於相比其他言說，三分說缺乏理論依據，只是彙集前史遺文的隻言片語，因而始終沒有發展到成熟完備的狀態（頁254）。

第八章研究了嶺南北部屬荊說。該說在唐宋時期已經出現，可見於部分嶺南地方志以及單州列舉體例的地理總志，這兩種文獻中屬荊的州多分布在嶺南北部毗鄰荊湖的地區。北部屬荊說的流行與嶺南長期被視為原始蠻荒之地有關。原始蠻荒的標籤使得唐宋嶺南士人有擺脫嶺南身分的傾向，這種傾

向推動嶺南北部士人在地理書寫方面有意將該地從嶺南切割，與荊楚產生聯繫，藉此為當地尋求一個更加確切的華夏身分，從而出現「脫揚屬荊」的現象。

全書的第三大部分附錄，將九州分野研究的地域由嶺南轉向江西。江西地區的九州分野自漢至唐多為屬揚，但自宋以後，江西整體屬荊州的言說開始大量出現。江西屬荊說源於王勃〈滕王閣序〉中「星分翼軫」的辭句，該句將洪州分野歸屬翼軫，翼軫對應荊州。這種表述並不符合江西屬揚的主流認知，持江西屬揚說者將其視為「錯誤」知識。但得益於〈滕王閣序〉的經典化，這個「錯誤」知識在宋代的文學語境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接受，屬荊成為洪州乃至江西分野的常見言說（頁315）。但在地理、經學文獻中，該說較為少見。

綜上所述，該書雖然着眼嶺南的九州分野，但其學術貢獻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回應了天下觀的問題。該書立足分野的角度，藉費孝通的理論提出「地理差序格局」，從而揭示出傳統的「中國-華夏」內部也存在着等級差異。其次是九州分野的起源問題。此前有學者認為九州系統在隋唐才納入分野理論（參見邱靖嘉，《天地之間：天文分野的歷史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20，頁156），但該書通過分析〈呂氏春秋・有始覽〉，將狹義九州分野的出現時間提早到了先秦。第三是梳理了九州分野在唐宋地理文獻中的呈現方式。該書整理了唐宋時期共21部文獻，詳細分析了每一部文獻的九州書寫體例以及相互關係。雖然已有學者做過類似研究［吳修安，〈先秦「九州」說及其對後世的影響——從兩漢刺史部到唐代地理文獻編纂〉，《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55期（2016年6月），頁32—37］，但該書的內容更加全面細緻，覆蓋了唐宋時期幾乎所有的相關文獻。最後，也是該書最突出的貢獻，即系統地研究了嶺南九州分野的言說。該書不僅梳理了文獻之間對嶺南九州歸屬的分歧，詳細研究了不同言說的成因和流傳情況，並試圖發掘不同言說背後時代人群的主觀世界。該書是學界第一部從九州分野的視角研究區域地理認知的專著，其學術水準和相應貢獻完全值得肯定。

該書也存在一些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地方，較為明顯的有以下幾處。第一，對前人研究有所忽略。第五章論述西部屬荊，提出西部屬荊說在唐以後的流傳與嶺南分為東西兩個政區有關，這個觀點與何俊宇的研究有相似之處。何俊宇指出廣西分野在唐宋時期呈現荊州南拓、揚州東縮的趨勢，認為這是廣西在唐以後走向高層政區的縮影（參見何俊宇，〈明清廣西地方志「荊揚分野」問題探研〉，《中國地方志》，2022年，第6期，頁45—52）。

何文的結論合理與否另當別論，其與孫書的研究具有相關性，都涉及嶺南地區的九州分野，或許應當有所提及呼應。

第二，對唐宋地理文獻九州書寫體例的梳理似仍留有討論的空間。該書認為晏殊《類要》地理部分的體例為單州列舉（頁78），但實際上，《類要》地理部分還同時存在廣域比附的體例。《類要》地理部分以宋代政區為綱，其中荊湖南路、京東路、河東路、梓州路、利州路下分別記載了該路的九州歸屬（晏殊，《晏元獻公類要》，清鈔本，卷2—8）。考慮到還有大量單州列舉的情形，《類要》地理部分實際上採取以當代政區為綱，在高層政區與統縣政區下皆追溯九州的體例。這種體例在明清時期較為常見，如《大明一統志》、〈武備志・方輿〉、《讀史方輿紀要》、嘉慶《大清一統志》等，均採取該體例。儘管這種體例在唐宋文獻中相對不顯，但也應列為書寫九州分野體例之一。

第三，「九州分野」定義的泛化。該書所謂的九州分野是廣義的九州分野，即只要描述某地在九州中的位置，即使沒有與星紀、星次、州國等因素對應，也屬於九州分野的範疇，這種做法自在情理之中。但該書隨後又言，有的文獻不明確記載九州歸屬，只涉及天文分野和州國分野，這些文獻也應納入「九州分野」的範圍（頁9）。誠然，九州與星紀、星次、諸侯國的對應關係已在〈隋書・地理志〉中得到闡述，但這種對應關係並沒有被後世嚴格遵循，九州分野與天文分野錯位的現象並不罕見（頁156）。況且天文分野、州國分野和九州分野本就是不同的分野體系，明清地方志也多將星野和沿革分別敘述，其中多有不對應者。例如雍正〈廣西通志・沿革〉採用九州分野，大體北部屬荊，南部屬揚；〈星野〉採用天文分野，將廣西大部分地區歸屬軫宿。因此，只提及天文分野或州國分野的言說是否應該被視為九州分野，還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

段笑童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

**梁其姿，《南方的想像：環境、身體、疾病、全球化共構下的近世華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5年，232頁。**

嶺南地區位於五嶺以南，包括今天的廣東、廣西、海南以及越南北部地